

悠悠歲月憶邵翁

往事鉤沉



有一位先賢與今年的兩件大事緊緊相連。一九二一年他即是中國共產黨黨員。今年九十一年黨慶，焉能不念及他。一九一一年他作為孫中山的追隨者，與武昌起義的將士們遙相呼應，一舉推翻帝制。今年辛亥革命百年紀念，焉能不提及他。要問他是哪一個？錢塘江畔邵力子是也。

邵力子，一八八二年出生於浙江紹興。二十四歲那年，他東渡扶桑留學，旋即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。翌年回國，先後創辦《神州日報》、《民呼日報》、《民籲日報》、《民立報》，宣傳反清思想，倡導國民獨立精神，為即將爆發的辛亥革命積極營造輿論。「五四」運動前後，他一方面在其創辦的《民國日報》上開闢「覺悟」副刊，宣傳新思想、新文化，另一方面又和陳獨秀等在上海發起建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。一九二一年，他以國民黨員特別身份跨黨加入共產黨，成為最早的共產黨人之一。邵公在這兩個時間段的所作所為，無疑為其留下了極為亮麗的兩筆人生色彩。

在以後的歲月中，特別是在國共兩黨兩次合作期間，他又繼續作出了永載史冊的貢獻，令後人敬仰。他曾在黃浦軍校和國民革命軍中擔任多項要職，為北伐革命做了大量的政治、組織工作。又他曾在抗日時期出任國民黨中宣部部長。期間，他不僅大力支持中共在南京創辦《新華日報》，而且積極准予《毛澤東自傳》在刊物上公開發表等等。惜乎，而今國共兩黨第三次友好時期，曾被毛澤東譽為「和平老人」的邵公已經作古經年，不再可能為兩岸黨人和兩岸同胞親自牽線搭橋了。但他那種追求和平、嚮往光明的高尚精神與人格魅力將永遠激勵兩岸人民攜手共進，最終走向統一。

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老人家於青年時期居然對翻譯一事饒有興致，且不乏真知灼見，如他曾寫有《譯書的我見》一文，刊載在一九二〇年七月八日上海《民國日報》上。是文稱：

譯書是一件很難的事業，讀書或者可以不求甚解（至多是誤自己），譯書卻萬萬不能如此，否則，誤導讀書的青年，對不住社會，更對不住原著者，如果譯高深學術的書，不但文字須精通，即和該書有關聯的各種學科，也非經研究、略有門徑不可。

至於意譯，總不如直譯的好。意譯可以偷懶，躲閃；有看不懂的地方，不妨用己意猜度，竄改，或者竟忽略過去；別人要指摘他謬誤，他還可以辯稱，說「這是不關重要的地方，所以我把它略去」。直譯則一句不容忽過，有看不懂的地方，自然也寫不下去，倘使他大膽寫下去，別人也就一定看不懂，很容易的知道他這書是毫不足觀的了，遇到西文結構和中文十分不同的地方，自然直譯者也當略變格調，不使有「佶屈聱牙」之弊，但斷不能含糊圓圈，說我是「意譯」的。

細細揣摩邵公的這兩節文字，可以發現其翻譯理念是何等地明白剴切。首先，翻譯是一項艱苦卓絕的事業，它不僅牽涉到讀者和作者，而且還與整個社會息息相關，是故譯書者必須對原著透徹理解，萬萬馬虎不得。其次，對於專業性很強的學術著作，譯書者不僅僅只是追求表層的文字順，更重要的是必須直探專著深層，對其所涉及的專業和與之有關的種種學科有所了解、有所研究。第三，意譯不足取。原因是這種運作彈性太強，小而言之，難免丢失不少有價值的信息；大而言之，可能篡改原著的本意，誤導讀者。第四，直譯最好，它能夠避免意譯的種種弊端。但理想的譯文必須傳遞原作的全部內容而不能有意義的半點流失，必須行文精煉自然通俗易懂而不能有表達的絲毫梗阻。要達到如此境界談何容易？惟有善於變通的智者，方能左右逢源、遊刃有餘，將原文玩弄於手掌之間，然後化作理想的譯文，上可令士林方家嘖嘖稱羨，下可令民間學人愛不釋手矣。

綜上所述，可知邵力子，不僅為中共黨史，為民國歷史增添了厚重的篇幅，而且也為翻譯理論補上了熠熠生輝的一頁。撫今思昔，豈能不令我們更加憶念這位可欽可佩的和平老翁？

副刊的性別

唐登瓊

某文學論壇上，寫手們爭論着一個問題：某報副刊編輯是原任好，還是現任好？爭來爭去，旁觀者都看出了端倪，無非原任編輯手裡發稿多的作者說原任好，現任編輯發稿多的作者說現任好。不過文人畢竟不同於小市民，太自私的論據端不上台面，於是一些體面的論據就出台了。

「以前趙編輯版面的文章文筆都很好，而且充滿思辨，令人回味。現在劉編輯盡發『婆婆碎』文章，家長裡短、東扯巴拉，一點意思都沒有。」挺原任的作者說。

「劉編輯貼近讀者，副刊不就是給老百姓看的嗎？何必故弄玄虛……」現任編輯的粉絲反駁道。

其實透過他們的爭論，隱約可以看出副刊其實是有性別的。趙編輯的副刊屬於男性，劉編輯的副刊屬於女性。

副刊在中國創始之初是男性，那時候中國女性大多數沒文化，報紙的編者和讀者絕大多數是男人，所以副刊也是男人的天地。那時副刊上的鴉鵝派小說，多少與如今的情感口述有些許相似，不過功能卻主要是滿足男讀者的情感意淫。至於魯迅等人的雜文、散文，將副刊推向了其歷史頂峰，此後一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初，副刊基本都是嚴肅的，男性讀者佔多於女性讀者。都市報、休閒晚報的興起，漸漸改變着副刊的性別。從九十年代末到今天，副刊裡女編輯漸漸成為了主力，副刊緊貼世俗生活淡化思維性，也漸成趨勢。然而，副刊讀者是否已經變成了女性為主？這點卻無人敢下斷言。

從自費訂閱報紙的家庭來看，一般男讀者會喜歡看政治、軍事、體育新聞，女讀者更有可能喜歡副刊。不過從零售攤點分析，買報紙看的男讀者又遠多於女讀者。至於單位訂閱，大多數是嚴肅的時政類日報，他們的副刊始終繼承着文學性、思想性的特點。

互聯網的普及、智能手機的興起、電視情感節目的氾濫……這些都在分流着追逐時尚的女性讀者。不知道是不是有感於關注度的持續下降，許多報紙的副刊在萎縮，甚至消失。

一個社會，只有男女比例協調才可能穩定。副刊想要生存發展，也應該「男女搭配」。單一傾向男性或者女性讀者，首先就自斷了一條胳膊。一旦市場出現波動，另一條胳膊也很可能不保。

魯迅等前輩開創了中國副刊的黃金時代，副刊成為了世界報林中獨具特色的中國奇觀，但願它不要在我們這代人手裡被終結。

在陷害林沖的第四環節，陸謙、富安等人，竟然不遠千里趕往滄州，勾結監獄管理人員，試圖風雪夜在草料場縱火把林沖燒死。林沖真是命大，對於這一謀劃計劃，他不僅躲過了而且聽到了。當林沖持刀用腳踏住陸謙胸口時，陸謙竟然這樣辯解：「不干小人事。太尉差遣，不敢不來。」林沖罵道：「奸賊！」兒子的痛苦，魯瑞早已瞭然。但她竟任一個十三歲的孩子去獨自面對這一切，作爲一位母親，她真的替孩子想得不多。

可能因爲是家中最小的女兒的原故，魯瑞凡事頗以自我爲中心。丈夫患病後，她母親對她說的一番話，就頗耐人尋味，「現在他有難，你千百萬不可刺傷他的心，更不可嫌棄他，而要盡心盡意地寬慰，讓他面臨康復起來才好。」不知是魯瑞無意中當着母親的面嘆息自己命運不濟，還是已流露出對丈夫的埋怨。不過即使是以母親先敲敲警鐘，怕也是對女兒不很放心的原因吧。魯瑞阻止小兒子周建人外出求學，哭述的理由是：「如果你也走了，我怎麼生活下去？我一個在家怎麼辦？我一定要少活幾年。」周建人的小舅舅曾極力相勸：「大的出去了，將來羽毛豐滿，各自飛了，這個留在家的，要變成鵝鴨的。這樣的例子我看多了。」魯瑞仍未答應。周建人後來解釋，也許是母親因他「瘦弱多病」不放心，或是當時「女人是不能出門拋頭露面的」，自己留在家裡可以幫她做些事。這其實更像爲母親找的藉口。論身體，差點因染上天花喪命的周作人也實在強不了多少；說女人不能拋頭露面，同時代的馮順弟家裡外多靠自己。後來，在日本留學的魯迅中途回國，也是「因爲母親和幾個別的人很希望我有經濟上的幫助，我便回到中國來。」而到北京後，尤其兄弟失和，魯瑞隨大兒子同住，每天只是聊天，讀小說。常常讓魯迅的一群學生

陸謙對於林沖的陷害，白虎堂——野豬林——草料場，重重殺機，步步緊逼，逼，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。如果有誰交了陸謙這樣一個朋友，真是倒了八輩子血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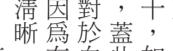
林沖能夠逃脫這連環陷阱，保住性命，投奔梁山，只能是小說的虛構，人豈能如此幸運？應當指出的是，這其中的每一個環節都有高俅的身影，不是直

接策劃就是間接授意。由此可見，在陸謙與林沖的友情之間，一旦強大而邪惡的權勢插入，在社會與良心的天平上，友情往往傾向於權勢。這幾乎是檢驗一友情是否真誠的重要尺度，這個標準幾乎從來如此。

交友警惕陸虞候

安立志

文史叢譜



陸謙的陰毒在第三環節即野豬林的謀殺案中，得到進一步印證。在董超、薛霸押解林沖去滄州之前，陸謙還有着某種無奈與急切的報復心。他爲陷害林沖而對林沖妻子的佔有爲目的醜惡行徑，畢竟有着個人私利的算計，那就是陸謙在高俅與林沖、權勢與友情之間，作出了賣友求榮的選擇。爲私利投靠

於兄長「林沖」如何解入開封府，如何脊杖二十，蓋如何充軍遠惡軍州，陸謙並無良心的愧疚。

對於白虎節堂的圈套，只能依靠着是，林沖因爲在當時，他這位「賢弟」的猩獰面目並不

清晰。

陸